

危机中的变革

自“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是以人类历史上相当特殊的方式，即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方式来推进本国的现代化的。反叛自身的主流文化传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民族富强的基本手段。

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

保守主义者为防止失范而求助于传统，而激进主义者又为了现代化的政治新生力主进一步否定与抛弃传统，这种两极对峙与“二律背反”不断在新的条件下的重复与循环，是导致现代化过程中的激进与保守这两种力量的相互冲突与此起彼伏的消长的根本原因。

萧功秦 著



现代化成功与挫折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现代化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而在于国家或社会中能否形成解决矛盾、问题与冲突的能力，更进一步说，是能否形成一种促进、维持与控制变迁的能力。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

危机中的变革

萧功秦 著

清末现代化
进程中的
激进与保守

上海三联书店

危机中的变革 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

著 者/萧功秦

责任编辑/陈达凯

装帧设计/鲁继德

责任制作/朱美娜

责任校对/邱 红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装 订/上海天华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15 千字

印 张/10.75

印 数/1—7000

ISBN7 - 5426 - 1208 - 5
K · 76 定价 16.20 元

序言

—

在中国历史上,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在西方挑战的持续冲击下,在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此后中国便进入大规模变革的历史时代。

人们可以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历史变化中看到,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的挑战持续震撼长达近六十年之后,中国的士绅精英与民众才真正开始动员起来,并投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进程,去拯救这个古老民族的危机,去改造这个沉默而停滞的庞大帝国,并为本民族去寻求新的历史道路。危机中的变革便是这一历史时代的基本主题。

这种新的历程,是孔夫子之后的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哪怕是千百年以后,未来的人们,都会十分清楚地辨认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乃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漫长历史中的最为重要的分界线。

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为了摆脱民族危机与实现富强,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思想与精神生活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的问题。由于国内与国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观念价值因素的

制约,由于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困境、问题与矛盾,具有不同的经历、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的人们,为了应付这种问题环境便会作出各种政治选择,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到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权威政治,以及此后的五·四思想运动,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不同阶段先后出现的政治选择。

这些政治选择中,有的较为激进,有的则相对保守,彼此相互冲突对峙,种种选择又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不同的既得利益的考虑与动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国从此也就在这种种选择的交替中,从传统社会向更具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进行转变。

在这一段历史中出现一系列现象:外力压迫的加深,中国各阶层对这种压力作出的反应,为适应这种外来挑战而对传统器物、制度与思想价值作出的变革与更新,新旧制度与文化交织而出现的矛盾、问题、困境,新旧规则冲突而出现的社会失范,为克服或摆脱这种种危机、问题与困境而作出的不同的思想解释与相应的政治选择,这些选择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崇高而纯真的理想主义与既得利益者的老谋深算,强烈的追求民族富强的动机与对传统文明失落的伤感,对新事物的向往与对旧文化的依恋,激进与保守,对民主与专制、自由与权威的价值的评价与论争,等等。凡此种种,都构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与思潮冲突的丰富内容。

二

十九世纪末期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这种危机对于中国的变革来说有什么意义与影响呢?

如果我们把十九世纪末以后的这一段历史,称之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史”的话,那么,一个最明显的事是,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人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实际上是越来越走向激进,走向与这一民族以往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思想

文化传统作根本的决裂。

现代化过程中的激进思潮，是人类谋求发展与进步过程中的一种思想与价值选择。它的最基本涵义，是从根基上否定现存旧秩序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否认社会变迁的过渡性与阶段性，力求用某种被人们视为理想的道德秩序，迅速、全面、彻底地取代现存旧秩序与制度体系。激进变革论为实现其目标而设计的方法与途径，则是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快刀斩乱麻的，认为非如此不可能重建理想的社会。激进主义的心理基础是政治浪漫主义。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原义，是指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某种对象上去，通过这种外向投射与移情作用，来抒发、宣泄人们长期受到压抑的深层愿望，并获得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升华。

这种激进变革心态与思维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康有为在变法奏折中提出的“大变、全变、快变”的变法思路。在康有为看来，传统乃是“朽木粪墙”，因而认定中国人只有“别立堂构，拆而更筑，乃可托庇”。康有为与他们的变法同志们，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作出变法战略的。

到了庚子事变之后的新政时期，要求“快速立宪”的激进立宪主义战胜了渐进立宪主义而成为士绅官僚与知识分子政治选择的主流，清王朝也就在它所启动的立宪运动的风浪中引火烧身，迅速崩解。

1911年建立的西式的议会政体，可以说是一种与中国自身传统没有任何关联的全新政体结构，中国的特殊的议会观的形成又与我们这个民族自二十世纪以来特有的一种激进思维方式有关。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变革精英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变革必须是急剧的、大幅度的、全面而根本性的。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种占主流地位的价值倾向是：与自己古老的历史传统作根本的告别，是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从 1898 年的戊戌变法以来，激进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一直支配着二十世纪大半时期的中国政治选择的基本走向，主流的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人们可以看到，自十九世纪末以后的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思想价值中，激进的变革思维模式具有持续的深层同构性。

事实上，从历史因素互动的角度来看，西式的议会制政体在民国建立伊始，就被激进地移植到中国社会的母体上，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缺乏社会力量支持的西式议会政体导致民国初年的严重政治失范：政治腐败，连续不断的党争与内阁危机，并由此进一步导致对早期议会政治反动的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与帝制运动，而这种种历史的反向运动，又进一步激起更大规模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浪潮。

正是在这种保守与激进的拉锯战中，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断流失消散，这又进一步地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失去可资凭借的文化资源。

在二十世纪初，严复曾用“新者未立，旧者已亡”来表达他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失范的深深忧虑。文化失范使新旧社会规范均无法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由此必然产生种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综合症。然而，在激进思维框架中，由文化失范所引发的种种败象却被认为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与专制政治腐败的具体表现与流风所及，于是，导致人们进一步对中国的传统作出更为彻底的清算。这样，在激进政治选择与文化失范之间，又出现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

三

伏尔泰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了解过去时代的人们是怎样想的，要比了解他们是怎样行动的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有意志与选择能力的人类，正是通过自己所认定并信奉的理念与思想原则来

自觉地确定自己所选择的行动的基础，并根据自己认定的思想目标来创造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一个时代人们的主导思想倾向与心态特征，是理解一个时代人们行动取向的钥匙。

中国近代以来变革中的激进理念、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是怎样形成的？它为什么会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思想的主流思潮？这是思想史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对理解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走向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单纯的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有其局限性。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往往习惯于从思想家的言论、观念以及他所使用的概念范畴的演变中，来探求某一时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轨迹与趋势，这种以概念逻辑为对象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固然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并且也常常以其简洁的论式使人们的理性得到满足。然而，要研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所经历的急剧而动荡的历史变革，要研究那些席卷广大人群的思潮与思想历程，这种以思想家言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未免捉襟见肘，过于简单了。而且，它还可能使人们陷入“思想观念决定论”的陷阱，它会使人们误以为，一个民族的重大的历史选择与动向，可以从思想的逻辑基因中演绎出来。如果用它来解释复杂的历史事变，那就片面得近乎荒谬了。

事实上，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正如历史本身的发展与演变一样，乃是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矛盾、国际环境与其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当研究者认识到，思想逻辑的矛盾本身就体现了历史现象中的具体矛盾时，人们的研究才有可能避免舍本逐末。

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如果人们在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激进变革思潮的历史起源时，与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寻求中国古老的思想传统中是否存在“激进主义”的文化基因，与其从当时的言论家思想家的理念中去寻求其中是否存在导致激进主义的逻辑结构，那么，还不如在一个更为广阔丰富的历史背景上，在一个时代的人们面临的“疑难问题”的困境中，去研究近代变革中的各种

制约因素与两难矛盾。因为只有这样，只有在具体的历史事实的多因素的综合考察中，才能发现近代激进主义思想的真正起源，并且也只有对这种种具体矛盾的研究，才能发现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一些基本表现方式以及发展演变的轨迹。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书力求通过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这一段近代变革历史的具体研究，来分析中国传统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面临的两难困境与变革过程中的种种危机。作者力求以这些因素彼此复杂的相互作用与交织为基础，来分析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在压力下产生的心态特征，并进而研究一种特定的心态(*mentality*)是如何导致人们以特殊的方式来认知现实，理解现实，并进而作出政治选择的。

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心态与政治选择这三个层面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不但使历史过程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而且也将有助于具体地展示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的复杂与艰难性。正是这种变革的复杂性与艰难，才足以使人们理解中国变革中的激进思维方式的类型特征，以及激进思维与心态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戊戌变法到清末变革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激进思潮的起源的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激进与保守，是理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复杂与深刻性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激进主义的反思与研究，是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分子自我认识的历史资源。

四

本书从结构上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文化背景的逻辑思考。这一部分主要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导致中国文化与传统政治的保守性。从自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历史来看,由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与政治社会体制的保守性、封闭性与僵滞性,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社会对西方挑战的“综合反应能力”。民族危机在十九世纪末进一步加深,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的变革运动也就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

第二部分是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在保守文化的氛围中,中国特有的民族危机感,对于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中国早期变革人士的激进思维的基本特点。本书从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派人士在危机压力下产生的焦灼与亢奋心态,“大变、速变、全变”的激进思维方式等方面,揭示早期中国变革派的以焦灼感为主要特征的“心态型”的政治激进主义,并进而分析了产生这种导致改革失败的激进思维与中国传统的“极致主义”文化的关系。

第三部分是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新政无疑是比戊戌变法更为广泛、持久深入,并对社会变迁产生巨大历史影响的变革运动。对新政运动的研究将为人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提供更为丰富的启示。这一部分将重点分析当清末的最高决策层业已认识到体制变革的必要性之后,中国新政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权威危机的形成,制度变革引发的“改革综合症”,以及人们在仿效西方制度时出现的那种简单化的“宪政制度决定论”思维方式。作者认为,上述这些矛盾的相互交叉,构成了清末立宪思潮走向激进化的基本原因。在这一部分中,还将分析以“危机论”为基础的激进改革论与以“条件论”为基础的渐进改革论之间的思想冲突。这对于理解传统集权官僚体制的变革中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是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过去被人们研

究过的历史，并力求发现过去所没有发现过的意义。这是因为，时代强加给人们的问题会迫使人们从消逝的历史中寻找产生这些问题的历史渊源。

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进行学术思考的结果。作为中国当代改革初期思想解放思潮中一名攻读中国历史的研究生，作为八十年代之交思想论战的直接参加者，这种特定的经历使我从八十年代末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已经把对现实的思考与历史学术的思考融合在一起了。现实变革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困境，为我提供了理解历史症结问题的切入点，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感悟心得与新知，又为我进一步认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提供了学理上的资源。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有可能较之前人有所深入的话，那么，这完全得益于当今变革的时代为我们的历史反思提供了比前人更多的东西。

谨以此书献给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人们，让我们共同理解二十世纪初期的前辈们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所历经的种种失败，让我们共同领略他们求索的艰辛与苦痛，共同分享他们的经验与智慧。作者在本书中对那些现代化事业的早期献身者，尽管不乏相当尖锐的批评，但是对他们的敬重之情决不亚于他人。让所有这一切，在理性冷峻的思考中转化为进一步前进的精神资源。

我们深深地知道，在中国现代化的未来成功中，必将凝聚着以往所有为这一神圣目标而献身，并经历过失败的人们的智慧与血泪。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文化背景

一、传统国家与“感应型”现代化.....	(1)
二、中国传统主导价值体系应付西方挑战的特点.....	(4)
三、中国传统官僚政体与制度弹性.....	(8)
四、传统主权国家现代化的两种趋势	(12)
日本: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融合的模式.....	(12)
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两极对峙模式.....	(14)

第二章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基本反应

一、政策创新是清王朝变革的起点	(17)
二、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一个无所作为的时期	(19)
三、洋务运动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	(21)
四、甲午战争以后:危机驱动型变革阶段的开端.....	(24)

第三章 清末变革新阶段的来临

一、戊戌变法：变革的制约条件	(27)
二、戊戌变法面临的基本困难	(29)
三、改革的有利因素：政治共识在官绅阶层中出现	(31)
四、慈禧与光绪：最高权力的二元化格局	(32)
五、官僚政体下的政策创新的适度性	(39)
六、专制政体下的变革：“费边式”战略的意义	(41)

第四章 戊戌人士的变革心态与政治战略

一、变法人士的“意识—心理结构”	(44)
二、戊戌激进心态的五个基本特点	(45)
三、光绪与康有为：激进变革势力的形成	(53)
四、康有为的改革战略失误的四个方面	(59)
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59)
“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60)
对传统政治的中心象征的挑战	(61)
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	(64)

第五章 政治冲突的两极化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一、变法过程中的冲突两极化趋势	(68)
二、戊戌年七月中旬后光绪帝的激进政策	(72)
裁汰冗官事件	(72)
礼部六堂官罢官事件	(74)
从开设制度局到懋勤殿事件	(75)

三、光绪帝的焦虑感与两难困境	(76)
四、康有为接受密诏后的对策	(78)
五、联袁围园：康有为孤注一掷的选择	(82)
六、袁世凯为什么告变	(84)
七、慈禧太后再度掌权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90)

第六章 戊戌激进主义与中国“极致性”政治文化

一、同时代人对变法失败的反思	(93)
“徐以心腹分任骏寄”：费行简论变法应采取的战略…	(93)
“养锋锐以和平”：皮锡瑞论官僚政治下的变法策略…	(95)
改革者的政治哲学：尹彦禾论“中庸之道”…	(96)
“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严复对戊戌变法派的批评 …	(98)
二、变法激进主义是对因循守旧的反动	(100)
三、官僚政体下变革的两难矛盾	(102)
四、人格魅力与世俗理性：“类宗教人格”的两难矛盾 …	(106)
五、戊戌激进主义与传统的“极致性文化”	(110)
六、结语	(114)

第七章 清末新政：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

一、新的变革时期的到来	(118)
二、变革已经成为新政时期的基本共识	(119)
三、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	(121)
四、影响新政过程的三个基本因素	(123)
五、清末新政的三个阶段	(125)

第八章 辛丑变法：清末新政的序幕

一、“庚子西狩”与慈禧太后政治态度的转变	(128)
二、改革诏书的发布与社会反应的冷淡	(131)
三、“辛丑变法”的主要内容	(135)
四、回銮后的慈禧与光绪精神状态的变化	(137)
五、中间派掌权：辛丑变法时期的权力中枢特点	(141)
六、权威资源的流失对新政变革的双重影响	(144)
七、列强压力下的新政：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	(148)

第九章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立宪的“文化误读”

一、近代中国人的立宪观的起源	(152)
二、“制度决定论”：一种“早熟”的立宪观	(156)
三、日俄战争对中国立宪思潮的刺激作用	(157)
四、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及其两重性	(161)

第十章 英国模式与日本模式：清末立宪派的两种选择

一、亲贵立宪派的政治资源与作用	(167)
二、权势派及其作用	(172)
三、士绅官僚派：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	(177)
四、英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君主立宪制的两种范本	(181)
五、保守与激进的立宪派：立宪运动的内部分歧	(184)
六、清末新政过程中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	(188)

第十一章 保守与激进：反对派与立宪派的思想论战

一、清末立宪运动中的反对派	(192)
二、从廷臣会议看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政争	(194)
三、“危机论”与“条件论”：激进与保守的两难选择	(198)
四、清廷筹备立宪国策的正式宣布	(201)

第十二章 立宪缓行派为什么主张“开明专制”

一、中国需要立宪政治还是开明的专制政治？	(205)
二、“立宪救国论”与“立宪危机论”	(207)
三、中国士大夫能否胜任于宪政？	(209)
四、立宪是否应该以本国的习俗为基础？	(211)
五、中国是否具有西方立宪的原动力？	(214)
六、只有保守渐进才能使中国立宪取得成功	(217)
七、立宪缓行派的基本思想：启蒙专制主义	(218)
八、立宪政争的发展趋势	(221)

第十三章 科举制的废除与清末游离态的社会动员

一、科举制度与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性	(226)
二、“科举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与消极性	(227)
三、变通科举与废除科举：两种不同的改革选择	(230)
四、科举制的废除与社会凝聚机制的瓦解	(232)
五、士绅阶级的消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36)